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文本耕犁、 学理阐释与创造性应用

陶绍兴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文本耕犁下的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具体包括作为分离的共同体社会组织、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及由“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在特定语境中,还泛指“联合”与“企业”,等等。学理阐释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内蕴着个体不能脱离共同体的主体向度、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共同体的演化正相关的时间向度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空间向度等三个向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然出场适逢其时,它既是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现实问题的中国方案,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迫切理论需要。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超越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强劲动力。

关键词: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观;治理体系;价值观;世界意义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0)01-0001-08

一、文本耕犁:马克思恩格斯原生 生态共同体思想

共同体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论述关于共同体的思想,他们的共同体思想散见于各种著作中,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犹太人的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在这些著作中,社会共同体思想极为丰富,经典作家曾多次谈到“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现实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积极的共同体”等范畴。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除了艰辛的文本耕犁之外,别无它途。

1. 分离的共同体:“同业公会”“行会”之类的社会组织

马克思原初语境中的共同体意指分离的共同体,表现形式为“同业公会”“行会”之类的社会组织。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是从“同业公会”“行会”

“行帮”的意义上来使用“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针对布鲁诺·鲍威尔把“政治解放”理解为“人的解放”时指出,政治革命打倒了统治者的权力,进而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政治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人民同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众多表现”^{[1]44}。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的解放”,充其量只是“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事务从人民事务中分离,政治事务从普遍事务中分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和土地之间的差别作了深刻的阐述。这种差别作为一个本质的、重要的、包括全部生活的差别而存在。资本与劳动是完全分离的。从形式上看,劳动还具有表面上的社会意义,即劳动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还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从实质上看,现实的共同体“还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和完全自为地存在的地

收稿日期:2019-09-29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重点项目(2019SZJY130);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应用研究项目(2017ZDZ05);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应用研究项目(2018ZDH06)

作者简介:陶绍兴(1976-),男,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E-mail:taoshaoxing8237@sina.com

步,就是说,还没有从其他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自由的资本”^{[1]173}。

2. 政治共同体:国家

马克思也曾指认共同体就是政治共同体,就是国家。马克思表示,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向度考察人权:从形式上看,它是一种权利,是和其他人一道来行使的政治权利;从内容上看,就是参加国家的权利,即要“参加政治共同体”。马克思写道:“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所谓人权,确切地说,看看人权的真实形式,即它们的发现者北美人和法国人所享有的人权的形式吧!这种人权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只是与别人共同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共同体,确切地说,就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1]39}

马克思从人权的视角引入“共同体”概念,阐明人权是“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droits de l'homme(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1]40}在德语中,droits de l'homme(人权)不同于 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分野就在于前者是政治学概念,后者属于社会学范畴。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但在思想和意识中,而且在现实的生活中,都过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这其中,天国的生活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德国的庸人忽视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始终抱有着一种幻想,在不存在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要求参加政治共同体,在只存在政治特权的国家要求政治权利。因此,就有了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发生,“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己、扫除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竟郑重地宣布同他人以及同共同体分隔开来的利己的人是有权利的(1791年《宣言》)”^{[1]42}。

3. 共同体的生成: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视域中的“共同体”专指各种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关于共同体思想的爬梳,可以发现其中的概念运演

逻辑,即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历经“虚幻的共同体”,最终达到“真正的共同体”。

(1)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氏族”和“部落”。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指渊源于共同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术语是“Stamm”,包括近代所谓的“氏族”和“部落”。共同体首先是指“氏族”。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缺少“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经过考察之后,恩格斯用“血族共同体”指称“氏族”,“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2]154}。“血族共同体”也称“婚姻共同体”,分为蒙昧时代的群婚和文明时代的专偶制,即通过自然选择的最终作用——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

共同体也指“部落”——所有制的雏形。恩格斯有时把“部落”称为“共产制共同体”,即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他还引用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一书作论证:美国的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在其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摩尔根指明,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基层单位,从而为原始社会的全部历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2)真正的奴隶制:古典古代共同体和封建的共同体。从政治学角度观察,古典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同体是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而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则是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因此,不能把他们混淆,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在中世纪,只要能佩剑的等级是自由人,就像是有马的游牧民族就是自由人一样,他们都是共同体的参加者。

封建的共同体,也称“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封建的共同体是通过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解体而发展起来的,其本身也将随着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瓦解。这种共同体,“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这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1]522}。

(3)虚幻的共同体:资本家的共同体。资本家

的共同体是“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1]582},包括劳动的共同性和支付工资的共同性,“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1]184}。马克思认为这种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因为这个共同体无法解决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而任由共同利益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国家独立的形式,在国家内部,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阶级斗争学说是理解资本家的共同体的一把钥匙,而德国的理论家们对此却佯装不知。在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中,人的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而实际上却是“个人的十足的屈从性和非人性”^{[1]316}。

(4)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批判资本家的共同体所造成的异化现象之后,认为原始的共产主义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只是对异化的初步克服,是“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私有财产力图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1]185}。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是对人的异化状态的最终克服,展示的是“自由个性”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四个方面:首要条件是“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二是消灭分工。单一、机械的重复性工作让工人变得如此愚钝、麻木,也让工人失去了发展丰富的个性的机会。不是人占有物,而是物支配人。因此,共同体的作用不可或缺。三是以联合为基础。“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71}在这种联合中,把曾经作为某种独立的、受偶然性支配的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四是个人摆脱地域性、民族性的限制,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541}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4. 扩大了共同体:“联合”与“企业”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域中,共同体还被作为动名词“联合”来使用,与“竞争”相对。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中,狭隘的民族意识、狭窄的地域性观念从中得以扬弃,促进了人的解放。“这种很快出现的生产的必要性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1]578}。马克思还指认“共同体”为企业或现代工厂,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的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1]624}

二、三维坐标下的学理阐释:主体向度、时间向度和空间向度

“真理不是铸成了的硬币”,欲使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达到澄明之境,需下一番学理阐释的功夫。藉此,可以再现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的理论资源。经过三维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呈现为主体向度、时间向度和空间向度。

1. 从个体到社会:共同体思想在主体向度内的展开

从词源学角度考察,“共同体”的德语是 Gemeinschaft,英语是 community,由单词 communis(共同)和 unity(联合)构成。家庭、朋友圈可以被看作最小意义上的共同体。当文化、信仰、利益、地缘等更多要素加入,共同体就会不断向外扩展——地缘共同体、村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乃至国家共同体^[3]。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Tönnies)认为

指出:“除了人包含于‘共同体’这一概念之外,有关共同体的性质,并没有完全相同的解释。”^[4]共同体可以分为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等形式。其中,社会共同体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没有社会共同体也无所谓个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3}。就是说,人通过世界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而存在。

个体不能脱离共同体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核心要义。从社会主体的角度看,马克思对共同体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和丰富的,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家庭)和“部落”(扩大了的家庭)、同业公会、行会之类的社会组织、民族国家,等等,但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是,个人是不能脱离共同体而单独存在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1]42}

2. 从“自然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共同体思想在时间向度内的展开

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社会共同体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与马克思所描绘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高度契合。

首先是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自然共同体”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人需要依靠共同体的力量,才能得以保全和发展自己。个人是不独立的,他们从属于共同体,“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5]113}。“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5]468}其结果就是个人的“自我牺牲”,共同体吞噬了个体,个体淹没于共同体之中。

其次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虚幻的共同体”阶段。尽管人在共同体中,能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但却是畸形地、片面地发展。“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6]269}个人成了原子式的、精致利己式的个人。“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在后一种情况下,这

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在前一种情况下,存在着小工业,但这种工业决定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因此这里没有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业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1]556}

再次是“以人的自由联合为基础”的“真正的共同体”阶段。“自由人联合体”阶段,个人不再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偶然因素,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地条件”。同时,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俨然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的能力将得到全面的发展,“虚幻的共同体”中的异化现象将彻底得以克服,进而“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571}。

由此观之,唯物史观中的五阶段史,与共同体的发展史正好相对应:原始社会对应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奴隶制社会对应于古典古代共同体;封建社会对应于中世纪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对应于虚幻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对应于真正的共同体。五阶段论和三形态论是一致的,它们不是两种学说,而是同一学说——唯物史观的不同表述。

3.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共同体思想在空间向度内的展开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合乎逻辑地在空间向度内的展开,是“真正的共同体”得以实现的条件。“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生动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541-542}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个人摆脱地域性、民族性的限制,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539}“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

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首先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其次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能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最后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1]538}。由此,形成“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全面发展的人,“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的人。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也是最早预测到并已经被证实的全球化思想。“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35}马克思认为,鉴于全球化生产的内在动因矛盾,也就是说,由于资本扩张和大工业的成长,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三、创造性应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然出场

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并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决议、第七十二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决议等重要文件,凸显国际社会对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的迫切需要,其世界意义愈发彰显。

1.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时代之问亟待开辟共同体理论的新境界

习近平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7]66}西方资本主义的问题仍然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解释框架内——虚幻的共同体中得以说明。

在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共同体能且也只能以虚幻的形式呈现。马克思恩格斯共同

体强调未来共产主义世界的超验性、彼岸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当前现实世界的经验性、此岸性——强调人的“类存在”——基于整个“人类社会”立场,不断整合扩大人类共同利益,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真正共同体”奠定物质基础。因此,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人的“类存在”本质的充分展开。“命运相连,休戚与共”是人的“类存在”的真实写照。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7]481}。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坚定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7]482}。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关乎全球命运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很多西方国家已经风光不再,政坛乱象丛生。例如,美国国内的政治闹剧并未随大选结束而终止,各种力量围绕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内外政策以及“通俄门”等事件争斗不止,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8]人们不由发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

时代之问已经证明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带有浓厚强权色彩的现有国际秩序已经力不从心,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近年来,欧洲的民粹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各种黑天鹅事件此起彼伏,证明了世界已经迈入“后危机、后真相、后秩序”时期,输赢分化的人类命运意识呈现抬头之势。美国等西方国家,想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期望从别国的动荡中有所斩获。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坚持穷兵黩武式霸道做法,坚持以邻为壑,秉持冷战思维,在国际事务中,大搞零和博弈,对其他国家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说三道四,动辄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不惜采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正是基于需要建立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情势,中国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

时代之问已经证明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丛林法则之下的“华盛顿共识”不再是全球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呼唤要开辟一条新型发展道路,以拓展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途径。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形成的中国奇迹令世界叹为观止,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中国道路”。为那些苦于不发展而又想保持独立自主的国家实现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以参照的范本。

时代之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表明了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并产生了理论的时代。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体现了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盛行下的“中国担当”。

总之,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鲜明对比,使得即使是西方学内的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聆听中国声音、学习中国经验、汲取中国智慧。中国也在进一步汇聚中国力量、坚定中国道路、展示中国形象的同时,开始凝练中国理论、总结中国制度,不断开辟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理论的新境界。

2. 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解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然出场适逢其时,它既是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中国方案,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迫切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炼出来的标识性的概念,具有原创性、时代性和世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即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的当代证明,是“真正共同体”在现实条件下的替代方案,是“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转化过渡^[9]。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包括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共同营造良好环境。

首先是努力打造“包容发展、共享普惠”的利益共同体。利益是建立共同体的动力之源。追求和建立的共同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受追求者的共同利益决定和支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现实主义思维,将本国利益置于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视域考量之下,主张共享世界发展红利。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化解世界纷争、促进共享发

展的“定海神针”。

其次是努力打造“世界多样、文明互鉴”的价值共同体。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尊重各国人们自己选择的道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扬弃了冷战思维,坚持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超越了依附发展、文明冲突的西方文明,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新航标。

最后是努力打造“公平正义、共商共建”的责任共同体。中国是二战以后世界体系的受益者。中国无意于颠覆现有体系,另起炉灶,但要推动现有体系朝着公平正义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方面,中国以推动建设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抓手,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世界命运、人类前途系于各国责任担当,秉持共商共建原则,有事好商量,国际上的事情由各成员国商量,以包容式、参与式的伙伴关系协调处理各项国际事务,推动建立全球治理观。

3. 一种新的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联合国“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马丁·雅克盛赞“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因为中国为其他国家开辟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

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超越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即人类无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的外交事业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就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国家之间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坚持一律平等原则,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支持增加第三世界国家发言权。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较之于权力转移理论,新型国际关系更能够为那些想走向现代化道路而又保持独立自主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接受。

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了强劲动力。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困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甚嚣尘上,“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声音不绝于耳。其实,经济全球化遭遇困境只能说明资本逻辑主导一切下的全球化的路向走偏了。从内因来看,这是由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引发的。从外因来看,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秩序难辞其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化指明了方向。经济全球化是公平的,也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对增进世界福祉、维护世界和平功不可没。正确的做法是,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拥抱真正的全球化,反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一些国家出现的问题恰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而不是经济全球化本身所造成的。为此,全世界都要直面问题,寻找对策与出路,充分利用并仅仅抓住一切机遇,携手应对一切挑战,把控经济全球化方向,不使之偏离。各个国家都要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结合自身实际,掌握好全球化的节奏,既要积极进取,又要量力而行。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更多释放出全球化的正能量,坚持包容发展,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作为一种“新的全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占据了人类价值共识的制高点。冷战伊始,西方国家一度以“价值观外交”为工具,干涉别国内政,获取经济好处。“价值观外交”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北约也以“价值观外交”为噱头跟随美国的亚洲政策。外力推“价值观外交”,是一种虚妄的自大。潜意识中,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把自己的价值观奉为圭臬,总认为有责任推销自己的价值观。轰轰烈烈的“价值观外交”背后,都反映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在利益面前,“价值观外交”是经不起检验的。站在人类价值共识的制高点上,习近平提出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正式宣示“价值观外交”没有价值。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期望,正在引领世界潮流、形塑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处于“萌芽状态或初级阶段,但毫无疑问的是,它的破晓而出既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勾画了蓝图、指明了方

向,也凸显了新时期、新阶段中国领导集体新的全球价值观。”^[9]

四、简短的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进行耕犁,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生成变化的。因此,要在不同的语境中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当马克思恩格斯最终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时,他们并没有终结共同体思想,而是为共同体思想开辟了新的方向。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生态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一脉相承的人类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必将伴随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感召力上升的同时,带动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的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现了中国对全世界的责任担当。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尹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反思——第十六届《哲学分析》论坛综述[J].哲学分析,2017(12):160-166.
- [4] GEORGE A, HILLERY J. Definition of community: areas of agreement[J]. Rural Sociology, 1955(2):20.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8] 林德山.西方政坛乱象丛生绝非偶然[N].人民日报,2018-01-21(05).
- [9] 刘传春.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质疑、争鸣与科学认识[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11):85-90.

(下转第46页)

- 版社出版集团,2007.
- [9] 李群,安达甄,梁梅.新疆生土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 [10] 严大椿.新疆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 [11] 李群,安达甄,梁梅.新疆生土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 [12] 杨园园.新疆和田传统民居中的阿以旺厅研究[J].郑州:美与时代(城市版),2016,12(1):19-20.

An Analysis of Ayiwa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of Hotan Prefecture in the Xinjiang Section on the “Silk Road”

LI Yan-jun, ZHANG Han-wen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Since Hotan Prefecture is located on the South Road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determines the uniqueness of its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fact the research on the Ayiwang residential houses in this area is less systematical and the many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houses are slowly disappearing with time going on. Therefore, the study of its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Starting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this article obtains basic data of dwellings in Hotan by means of field research, and collects relevant information through surveying, drawing, and photographing mainly with the related data research as a supplement. Then it sums up the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yiwa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Hotan Prefectur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study.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Xinjiang Hotan Prefecture; Ayiwang; architectural features

【编辑 吴晓利】

(上接第7页)

On Marx and Engels' Thought of Community: Text Understanding,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Creative Application

TAO Shao-x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hui Business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ext understanding, Marx and Engels' thought of community, which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deals with such concepts a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s a detached community, the state as a political community, the generation of “real community” from “naturally communities”, and the general reference of “combine” and “enterprise” in special context. In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the thought contains three dimensions: the subject dimension that individual is incompetent to be divorced from community, the time dimension that the community evolu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spatial dimension that the history is turning into “world history”.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ving come out at a right time, provides a Chinese solution to tackle the realistic problem of “what is wrong with the world and what shall we do?” and also meets an urgent theoretical need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 and Engels' thought of community. As a brand-new view of world order, the initiative advocates the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recedes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the West. A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t is injecting strong impetus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view of world order; governance system; values; worldwide significance

【编辑 高婉炯】